

工商史料

1

文史資料出版社

.5

内 容 简 介

《工商史料》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选编的以戊戌改变以来中国工商界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为内容的历史资料。由于作者大都是当事人或知情人，以回忆录的形式写下来，因此，内容翔实、具体、生动，是有价值的近代史参考读物。

《工商史料》第一辑主要介绍中国民族资本工商业中历史悠久、驰名中外的厂店，包括申新纱厂、大中华火柴公司、天厨味精厂、同仁堂药店、瑞蚨祥绸布庄、东来顺羊肉馆等等。

工 商 史 料

(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沧州地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

1980年11月第一版·1980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¹/₃₂·印张：6⁷/₁₆·字数168,000
印数：1—8,200册 定价：0.75元
统一书号：11224·5

目 录

荣家经营纺织和制粉企业六十年·····	李国伟 (1)
仁立公司的曲折道路·····	朱继圣 凌其峻 (16)
大成纺织染公司与刘国钧·····	朱希武 (44)
陈启源家族和刘鸿生资本集团·····	黄逸峰 (55)
吴蕴初及其化工事业·····	吴志超 (63)
贵州茅台酒史·····	贵州省工商业联合会 (98)
我经营猪鬃二十余年的回顾·····	古耕虞 (118)
北京同仁堂的回顾与展望·····	乐松生 (152)
山东孟家与瑞蚨祥·····	刘越千 (175)
北京东来顺羊肉馆发家史 ·····	丁福亭 马祥宇 (192)

荣家经营纺织和制粉企业六十年

李 国 伟

—

我开始参加荣家在汉口所办的福新企业组织，是在一九一八年。我原在唐山工学院学土木工程，毕业后，到陇海铁路任徐州分段的副工程师，后调陇海总工程师局设计工程司。那时第一次欧战告终，英美帝国主义国家暂时放松了远东市场，还没有卷土重来。日本帝国主义乘战事机会，蓄意攫取东方霸权，而限于国力和机器设备的生产赶不上她国内的需求，一时还不能高速拓展。这样，就为中国民族工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我国国内很多纺织和制粉工厂都是在这个时期创立的。无锡荣宗敬、德生先生兄弟在上海和无锡从事纺织和制粉事业，到那时已有将近二十年的历史，正在逐步向高峰发展：纺织工业方面，上海有申新一厂和二厂，还有第三厂设在无锡；制粉工业方面，上海已有福新一厂至四厂；此外，茂新还有三个厂，分设在无锡。荣家企业的轮廓，已大体形成，基础亦渐趋稳固。

汉口为长江中游、汉水、湘江流域和豫省漯河以南等地区粮食的集中地，每年约有三四百万担的小麦在那里集中。那时荣家的事业还没有推广到汉口，当地有金龙、和丰、裕隆三家面粉厂，每日

生产能力约为一万二千包（每包四十九磅），每年尚有二百余万担的小麦运往长江下游，供应芜湖、南京、镇江、无锡、上海等地的面粉厂。因此，在汉口设厂不愁原料缺乏，福新五厂就是以这个有利条件为基础而从事计划设立的。这厂自一九一八年秋天开始筹备，到一九一九年十月全部完成，开工出粉，每日产量为六千包，此后逐渐增加到一万二千包。汉口申新四厂是一九二一年四月开始筹备的，其创设动机原是为了求取福新粉厂袋布的自给自足，到一九二二年二月开工，最初装置纱锭一万四千七百余枚，其后陆续增添设备，到对日抗战前夕，共有纱锭五万枚、布机一千台和日产二千匹的漂染整理机器全套。

在旧时代从事企业的人，对于用人方面，总是尽量采取保守态度，不是素所深知的人，不肯轻于托付重任，因此往往容易形成非亲即友的局面，从而也难于吸取社会上一般的人才；荣家资本集团自然也不能例外。荣德生先生在他的《乐农自订行年纪事》里面，似乎以“昔年老友，都为经理”而感到自豪，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荣家企业里面上层组织，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面的。我是德生先生的长婿，所以在他和宗敬先生的敦劝和支持下，我放弃了铁路工程师的地位，改行来办理工厂。我开始参加荣家的企业，是做汉口福新第五面粉公司的协理兼总工程师，后来申新四厂开办，我兼管两厂。那时任两厂经理的荣月泉先生，是宗敬、德生先生的族兄；其后他年老退休，我继任两厂的经理。

我是学土木工程的，对于纺织和制粉工业原是外行，而我从开始参加企业，所接受的任务便是负责全部工程和装机计划；两厂开工之后，工务推进也由我负领导的责任。我只好摸索前进，虽然后来得到一些知识和经验，但是走的弯路也很多。有些同事批评我，

说是“拆拆装装，枉费许多人力物力”，我是应该竭诚接受的。工厂创办初期，还是沿袭着工头和粉师的陈旧制度，机器运转和工人进退由其把持，工人群众受着双重的剥削，封建把头的声势和火焰更是日甚一日。厂方主持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既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来彻底铲除这个根深蒂固的封建把头恶势力，有时还利用这种恶势力，与它勾结着，来加强对于职工群众的剥削。其后由于产量日落，无法与外界竞争，而从剥削方面来讲，封建把头势力和资本主义之间也存在着利害的冲突。以此，我们逐渐使用专科毕业生来管理车间，革除了工头制度，提高了生产，机器保全也获得了相当的保障。

我们汉口的申新四厂、福新五厂自抗战内迁以后，申新扩建为汉口、宝鸡、重庆、成都各厂，共四个厂，附有宝鸡的一个铁工厂；福新扩展为汉口、宝鸡、重庆、天水、广州各厂，共五个厂；又从而推广附属企业，在成都、上海办了两个建成面粉厂，在宝鸡、上海办了两个宏文造纸厂，在重庆标买了国民党政府的军纺厂（原是汉口日商泰安纺织厂的机器），改名为渝新纺织厂。

关于茂、福、申新各厂的发展过程，主管机关已在汇编历史资料，从事说明社会经济的演变过程，我今不再作冗长的叙述。

二

由于利害的正面冲突和生存竞争的关系，民族资产阶级自始以来，对于封建势力、外国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随时随地作着不断的斗争；而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自私自利的企图，又随时随地和这三种势力敷衍拉拢，发生不即不离的关系。解放前我从事企业三十年，就是在这个环境中挣扎着度过来的。而追溯以前荣

宗敬、德生先生开始创业，以迄荣家资本集团的形成，其间盛衰变化虽年有不同，而一息脱离不了这三大敌人的魔影跟踪。设使没有全国解放，我们的企业早晚必落入他们魔掌之中而无可幸免。我今概括地叙述我对于茂、福、申新企业在解放前五十年来悠长过程中一些突出的回忆。

荣宗敬、德生先生从事于制粉事业，远在一九〇〇年。他们兄弟原来经营钱庄，获有盈余，因见办厂利厚，集资三万九千两，在无锡创设保兴面粉厂，荣氏兄弟各入股三千两，于一九〇二年开工出粉。从那时开始，就受到地方封建势力的阻挠和摧残。保兴兴建厂房时，所谓地方绅士以破坏风水为理由，提出诉讼，几经奔走疏通，方得平息。外国厂家和买办阶级在机器供给和技术方面，又多方留难，百般要挟。封建势力和外国帝国主义的磨难，在荣家企业方始萌芽的时代，就已经形影不离，跟踪而来了。其后保兴于一九〇三年拆股，成立茂新。到一九〇五年又集资三十万元，创办振新纱厂，荣氏兄弟各入股三万元，这是他们从事纺织工业的开端。振新建厂之初，也曾受到无锡当地封建势力的阻挠，借故兴讼，旋经和解了案。那时为公元一九〇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各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将货物运来中国倾销，统计全年全国进口棉布值银一亿一千五百余万两，为过去未有的高额。此后一年，即公元一九〇七年，全年洋粉进口增至四百五十万担，值银一千四百万两。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清朝政权昏庸无能，已为帝国主义国家所看透。经过甲午中日之战和辛丑辱国条约的订立，中国藩篱尽撤，“由他们为所欲为。再加上一八九五年中日马关条约订立，准许外人在中国通商口岸从事“工艺制造”以后，英商老公茂、怡和、美商鸿源、德商瑞记各纺织厂先后在上海设立。至一九〇二年，日商在沪收买泰兴纱

厂，改名上海纺织第一厂。外国纺织资本大量侵入中国，喧宾夺主，中国商人没有任何后盾，反处处居于挨打的地位，遭其宰割，而无可如何。荣氏企业的诞生，正赶上这个不幸的时代。

其后清朝统治灭亡，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篡取了政权，国家积弱如故，当局的媚外卖国也和清朝没有多大的区别。日商在沪设立了内外棉纱厂，进口纱支布匹同时源源而来，进一步垄断着中国纱布市场，中国厂家处境更是艰难。而制粉工业方面，虽有外粉进口，但压力比较轻松，故荣氏兄弟从这方面进取，于一九一二年又集资四万元创设福新第一厂于上海，日出粉一千二百包；一九一三年设福新第二厂，产量为四千三百包，一九一四年设第三厂，一九一五年又设第四厂。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美帝国主义暂时退出了中国的市场，我国工业生产获得空前发展，面粉产量由输入国一跃而为输出国，纱布市场亦渐见供不应求。那年无锡振新纱厂拆股，宗敬、德生先生退出，在上海周家桥创设申新第一厂，装英机一万二千锭，日出纱三十余件。从此年起，纱、粉各厂连年有余，即以盈余投入再生产。其后申新发展到九个厂，纱锭五十三万八千余锭，布机五千余台，全厂职员八百六十余人，工人三万一千余人，年产纱三十余万件，布二百万匹；福新发展至八个厂，茂新发展至四个厂，年生产能力为三千五百万包至四千万包。

三

民族工业在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威胁压迫下，经常处在多灾多难的情况之中。民族资本家设厂的动机，主要是为了想赚大钱，而历年外货的倾销和外国在华工厂的竞争，使中国厂家无法喘息。

为了挣扎图存，中国厂家不能不从各方面寻求出路，保本求利，因此，增加工人劳动强度自然成为各厂一致的政策。振新开办时，机器新（振新在当时国内纱厂中，是第一个用透平发电机，将单独电动机拖带纱机的），用人少，产量高，工资低，德生先生在他的《乐农自订行年纪事》里面特别指出，表示乐观。除攫取劳动剩余价值、增加私人利润而外，在经营管理方面各厂还是各有各的手法。宗敬先生时常对我们说，“茂、福、申新各厂得力于：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因之无月不添新机，无时不在运转；人弃我取，将旧变新，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薄利多做，竞胜于市场，庶几其能成功。”我那时最佩服宗敬先生的话，当我们汉口厂开办时，我还曾在纱厂日夜两班清（花）、粗（纱）、精（纺）、摇（纱）四部，分别用“和、衷、共、济、力、求、进、步”八个字来做班名，表示拥护宗敬先生的经营作风。德生先生更有他独到的见解，他时常自诩说，他经营事业，得力在于选择原料。茂、福两厂从不收进次麦，汉口小麦搀混石砂，他经常雇人拣择，逐粒剔出，所产兵船牌和牡丹牌面粉，牌子常在其他各厂之上。记得有一年雨量特多，他偶然出外巡视，见多数仓库外墙泛潮，墙脚水痕有时高至一二尺。他就联想到因天时关系，仓库潮麦必多，便马上通知各庄收麦人员特别注意不收潮麦、坏麦。结果那年无锡各粉厂都受到烂麦影响，产品减色，独有茂新的兵船粉品质优良，从此做出牌子，和阜丰的车牌并驾，售价也相等了。辛亥革命后，无锡市面呆滞，各厂都不敢放手进货，有一大批川麦销售不出，货主急于回川，愿将货留交茂新磨粉售出，再行归还货价。茂新得此周转，颇获其益。这又是善于利用机会所得到的成果。后来茂、福、申新的局面越搞越大，都是本于这种精神，

而几次陷入危机，濒于破产，也未始不由于此。

对于纱厂用棉方面，也是各有各的窍门。纱厂以前用两种棉花：一为土棉，统称粗绒，纤维粗而硬，自然捻度少，但是颜色白，相传它的花朵是向下的，天雨时花的托盘不积水，所以不会发黄；一为洋种，统称细绒，纤维细而软，自然捻度多，但是颜色白中带黄。那时为求纱支洁白，便利竞销关系，厂家都用粗细绒配合拼纺，销售员又时常以纱支黄了难销为言。我们汉口厂装的是美国萨克劳威尔机，对于粗细混纺不甚相宜，操作异常困难，产量极低，十六支纱每日总在一磅以下。往常粗细搭配比例，总是对搭，有时四六搭配。我在一九二四年黄梅季节时，因生活难做，减低使用粗绒，但是减低到一比九时，生活虽稍为好做，而产量仍不能超过一磅。我记得很清楚，那年端午节后，配花就不用粗绒，纯用细绒，两日后，十六支纱产量就突然跃进到一点二磅。我从此以后，也就不顾营业处的批评，全用细绒纺十六支纱，因之出数大增，每件工缴大见减轻，而纱支强力又自七十余磅增到一百二三十磅。我体验出粗绒与细绒合纺所以不能有良果，是因为自然捻度不同，而软硬又各异，勉强拼在一起，互相缠捻，是和物质性能有抵触的，因之生产低落，纱支强度不能达到标准。后来申新汉口厂的棉纱极受各方欢迎，尤其是布厂用作经纱以后，增加了布的强度，又减少了废纱，因之减少每匹布的用纱量。还有申新汉口厂所出十二磅细布不及裕华，我们经过多方研究，将每方英寸经纬纱各减少十根，另出一种轻质布，售价减低十分之三强，结果销路大畅，反超出裕华之上。这都是在资本主义经营时代所采取的策略，虽卑卑不足道，而在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钩心斗角，挣扎求存，在当时也很是费了一番心力的。

四

我们汉口申新厂在经营初期，还受到过一次严重的经济打击，几乎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吞噬。由于花贵纱贱，申新汉口厂自开创以来，就受着市面不景气的影响，无日不在困苦挣扎之中。可是我们汉口厂具备着一个优越的经济条件，即是和福新汉口厂在同一领导之下推进业务，资金来源绝大部分同是荣家产业资本。福新年年有利，申新依赖福新财力常年挹注，虽在事业亏累之中，仍不断扩充生产设备，对外亦以福新关系，周转灵活。但是这样下去，资产负债不可能平衡，而且情况日趋严重，福新一些保守派股东和汉口厂少数高级职员认为照此局势，福新五厂早晚要被申新四厂拖垮。他们就向上海总公司建议将申新四厂出卖，专办福新。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强对中国的侵略，纱布削价倾销，同时到汉口开设泰安纱厂，虽然只有二万多锭的规模，而成为日货向内地深入倾销的桥头堡垒，操纵着华中的纱布市场。他们的纱厂，厂址与申新毗连，同在硚口，见到有机可乘，四出活动，图谋买进。申新多数职工觉悟到这不仅是一厂一业的问题，而是关系着整个民族工业前途的问题，坚决反对此项出卖民族利益的提议，推出代表到上海向宗敬先生陈说利害，结果此议总算没有成为事实。

对付反动官僚和逃避官僚资本的吞噬，也是一桩煞费心神的事。官僚们看到工厂有钱，总想来个黄雀在后，不劳而获。这情况，在北洋军阀时代比较容易应付。他们的办法也比较简单，一般是将各厂、各银行的主持人请去开会，却关上大门讲斤头，不满所欲，不让出来。如果事先看出苗头，可以托故不去，也可硬挺软磨，讨价还价。北洋军阀政府垮台后，蒋介石背叛革命，成立了南京国民政

府，一贯地不惜牺牲人民利益，献媚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在双重压迫之下，更是陷入水深火热的境地。我常驻汉口，对于上海茂、福、申新总公司的事，虽然不大过问，而其间很有一些突出的事，至今尚在我的记忆之中。

我回想到一九二七年蒋帮势力达到长江下游的时候，上海方面由虞洽卿发起，号召各业捐款给国民党政权，表示拥戴。荣宗敬先生意有不愿，以为华厂独负此捐，将更不能与外厂竞争，因之应允稍迟。这样，就招致蒋帮不满，声言要查封荣氏家产，而宗敬先生住在租界，无法下手，乃嗾使无锡县府派人持封条前往荣巷，将宗敬、德生先生住宅封门。经再三关说，留出德生先生一部分未封，仅封了东面宗敬先生家属居住部分。后来托人疏通，还是化了一些钱，才将事情缓和下来。

我还记得，当年国民党政府裁撤厘金，施行统税，按照税则规定，大大便利了外国在华厂家，却增加了中国厂商的税负。申汉纱厂有人向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申述企业的困难，说明新税则的施行将进一步造成中外厂家生产成本的悬殊，希望政府加以考虑。孔不问情由，开口便骂纱厂捣蛋，说：“有困难，你们为什么不想法子克服？成本高了，你们为什么不让它降低？”这一番出乎人情之外的言词，使对方无言而退，税则就此实行了。

五

还有一九三四年国民党政府怎样对待申新的经济危机，更是一个显明的事例。由于过分追求发展，荣家企业一贯地举办利债来从事基建，扩大再生产，所以经常陷在高利贷的拖累之中，经济基础是不稳固的，遇到金融有变动，或是市场不景气，便首先感到捉襟见

肘，周转为难。自茂新、振新创业以来，遇到的经济危机，不止一次：第一次在一九〇八年，因为宗敬先生在上海做面粉失败，牵动了他所办的广生钱庄的资本，各行庄不肯放款，以致开支无着。第二次在一九一二年，振新原棉告竭，各往来户无法再借，召集董事会请各董事垫款，各董事不应，以致新年不能开工。这两次风险，所差不过一二万元，通过情面关系，再拿出一些田单契据，都勉强渡过了难关。第三次是在一九二一年，那时茂、福、申新系统已发展到茂新一至四厂，福新一至八厂，申新一至四厂，所欠债务在三百万元以上，结果还是在信用上取得了办法，未至摊牌。德生先生在他的《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上说：“借款成功，人人安心，喜形于色”，足见当时紧张的状况。

第四次经济危机的发生，是在一九三四年，当时我曾为这事被召到上海，参加集会商议。自一九三一年下半年起，中国棉纺织工业开始陷入逆境，一九三二年情况更趋严重，但在这一年中，申新系统营业仍获得盈利，茂、福、申新各厂全年纯利共达到四百万元以上。在一九三一年秋初，天津、河北一带和长江流域洪水为灾，农田大部浸没，非但当年秋收无着，而且因为积水不易疏泄，冬耕未能及时从事，以致一九三二年春收亦大为减少；春耕因缺乏种籽，未能普遍播种，又从而影响秋收。农村三度歉收，食粮尚感极度不足，更未遑添补衣着。同时，沿江沿海城市因洋米、洋麦低价倾销，国民党政府不顾民命，勾结美帝，以重筑堤防为由，借进大量美麦，但是不运入灾区为工赈口粮，而在市场变价出卖，国内粮价被压低过甚，以致农民粃一石谷，尚不能做一套衣服。因之，到一九三三年，棉纱销路滞极，价格跌至民国元年以下的水平。申新更紧，调款为难，九月底开期，各行庄无一肯转，后见申新九厂开出，情

况尚佳，才允转三个月。至一九三四年，不但纺织业遭到空前的灾难，而且面粉业也同时受着世界资本主义倾销的影响而无法周转。更加以美帝实行购买白银案，上海现银存底被抽去三分之一，以致物价狂跌，市况萧条。挨到那年三月，中国、上海两银行不肯再做借款，十六家往来钱庄亦坚决收回不放。六月底到期，应付款达五百万元，没有头寸应付。当时托宋汉章居间，商得张公权同意，由中国、上海两银行及十三家钱庄接受所谓“产余担保押款”五百万元，以为可以渡过这次风险。不料此项借款付至七月初，约支出了二百八十万元的时候，中国、上海两行忽然停付，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搁浅局面。

那时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是汪精卫，陈公博做实业部长，派工业司长刘荫菲等会同财部及全国经委会派员到沪调查。照陈公博的说法，申新负债已达六千三百余万元，资不抵债，其无担保的债务达一千余万元，荣先生信用已失，若仍以荣氏为中心，无法维持。因此，他就以此作为理由，向行政院提议“由政府召集债权人组织临时管理委员会，经营该公司现有九厂，至多以六个月为限，六个月后，依整理所得结果，再定具体办法”。当时宗敬先生已辞去总经理职务，由王禹卿先生代理，纺织部事宜由李升伯先生代理；事业搁了浅，王登报声明辞职，李也登了“不就申新纺织部职务”的启事，名义上和实际上总经理仍为荣宗敬先生。

陈公博所谓“整理”，究竟包含些什么内容，无法推测；有人说后面还有宋子文的操纵指示，企图乘危吞噬荣家企业。我们不了解在那个时期宋子文和汪、陈之间是个什么关系，不能加以什么断语，不过当时传说很盛，说是要收归“国营”，无锡纺织厂联合会曾有代电致行政院和财政、实业两部反对申新收归“国营”的事，

并对于实业部所作“估计”表示异议，举出以申新九厂为例，该厂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完成，计有厂基六十余亩，依照工部局估价，每亩地价二万五千元，厂房造价二百二十万元，现有纱锭八万枚、线锭一万五千枚、布机五百台，按照现市最廉价值，须在八百万元以上，而实业部及棉统会调查结果，仅估四百余万元；又如其他数厂，每锭购价至少须在三十元以上，而只估十七元，认为骇人听闻。无锡申新三厂亦同样向国民党政府具文申明，并说申新三厂并未亏累，不用整理，指摘国民党政府以维持为名，行摧残之实。此案结果，由行政院做出决议，说是“目前该厂虽稍有困难，既然由荣氏本人大加整理，此后如有需要政府予以协助，自当格外设法，以资维持”；对于陈公博提出的整理计划，也就从此不再提起。

六

申新经过搁浅风波之后，虽在尽力从事内部改进，而经济基础根本动摇，维持更极艰苦，到第二年，即一九三五年春间，又遭遇到英商汇丰银行拍卖申新七厂的事件，这又是帝国主义阴谋乘危吞并中国民族企业的一个典型事例。其先，申新在一九二九年购入英商东方纱厂为申新七厂时，即以二百万元押入英商汇丰银行，年息八厘，期限六年，到一九三五年二月限期届满。一九三四年六月，申新与中国、上海两银行及十三家钱庄成立产余担保押款时，也将申新七厂计入在内，而汇丰亦曾予以承认，因此申新七厂本身作了两次借款的抵押对象。汇丰押款到期，申新当然无法履行债务，汇丰以债权人的资格，不经过法律手续，即委托英商鲁意斯摩洋行定期公开拍卖。中国、上海两行见到拍卖公告，不能同意，也根据本身债权关系，呈请江苏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将该厂作为假扣押，

并布告不准出卖。帝国主义商人对于国民党政权久已视同无物，不顾一切，坚令鲁意斯摩仍于是年二月二十六日实行拍卖，并串出日本冈本、村上两律师作为代表日本某商业会社以二百二十五万元的最低价拍去。这一事件发表后，上海各界非常震动。各报社论，一致谴责汇丰非法行为，各社会团体激起公愤，热烈声援。申新七厂全体四千六百余工人更是轰轰烈烈地动员起来，奋勇护厂，严厉督促国民党政权对于汇丰此种摧残中国实业、侵害中国法权的行为速予有效制止。国民党政府迫于群众的坚强意志，派实业部长到上海去向汇丰磋商，拖延了很长的时期，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由宗敬先生与汇丰银行签订合同，将抵押借款二百万元延至一九四〇年底偿还，并将年息八厘改为七厘，并由申新于一九三七年付出利息十二万元，申七拍卖未予执行，此事算告一段落。实际到一九三五年下半年，由于世界局势的转变和内地农产的连年丰收，事业已有复苏气象。到一九三六年，申新各厂都已获得了稳定的盈余，汇丰债务也就顺利清偿。这件事在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帐上不过添了小小的一笔，而阴谋吞噬的凶恶印象，长留在我们记忆之中，我故举出，做一个典型的事例。

七

抗战八年之中，帝国主义退出了中国商场的竞争，纱粉工业为后方衣食所需，我们内迁各厂利用机会，都获得了一定的进展。我一心从事于后方各厂的经营，与申、汉陷区脱却联系，在这个时期之中，为了取得经营便利，并保持战时额外利润，通过迁川和迁陕工厂联合会，与国民党政权和各级官僚斗争的事例较少，而转入于拉拢敷衍，以求相安无事。抗战胜利之后，美麦美棉充斥市场，在

我国大量倾销。我们的面粉厂、棉纺厂受到挤轧，至不能喘气，力量薄弱的，不能免于亏本歇业。如芜湖的益新面粉厂，因不能开工而租给福新五厂经营，福新五厂亦因无利可得，反遭亏损，未及二年，即退租不做。美棉输入后，排挤了国棉的销场，压低了棉花的价格，以致农民减产棉花，在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我国棉花的年产量低至一千万担以下，大大减少了农民的收入，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我们从事复厂，在抗战将近结束的时期，向英美订购了很多战后交货的机器，交付了巨额的定金。战事结束后，各国对机器的需要增多，供不应求，英美帝国主义厂家一贯地移花接木，将造成现货另自高价售出，而对于定货合约延不履行，所有交货延迟期间，原料物料增价以及工资上升、甚至罢工风潮等一切与买主无关的因素，都片面地将损失转嫁到货价之内，使我们计划失去平衡，无法推进，复工无期，受到严重的损失。

抗战时期，我们受到的损失非常巨大。申新系统，以申新一厂和八厂为最惨，其中申新八厂全部被炸毁，申新一厂北工场、布厂、办公室、工人宿舍、饭厅、货栈、物料间等几于全部炸平，受伤工人三百五十余人，被炸身亡的有七十余人；而沪东的五、六、七厂损失亦极惨重。无锡三厂有纱锭七万余枚，为苏南最大工厂之一，被日寇用硫磺、火药、柴油焚烧，除了钢筋水泥的一座厂房之外，几乎全部被毁。各厂都长期停着工，其中申新七厂停工达到八年之久。面粉厂中，茂新一、三两厂亦全部被毁。我所主持的申新四厂、福新五厂部分，申新四厂损失了一千瓩透平发电机和相配合的锅炉大部分、纺棉机二万锭全套、布机五百余台、漂染整理机全套；福新五厂损失了制粉机九千包的全套、第一工场五层楼的全部